

19.07

台山革命回忆录

(第四集)

台山革命史编辑委员会
资料室

4-7

台山革命史编辑委员会编印

台山革命回忆录

第四集

台山革命史编辑委员会编印

1981年6月

内部资料
台山革命回忆录
(第四集)

(图书印刷许可证第五号)
台山革命史编辑委员会编
台山人民印刷厂印刷
1981年6月印成

目 录

一九三八年我党领导主办的台山青年抗战知识研究班	
.....	李国锐 (1)
一九三九年夏在台城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	
.....	梅重清 (4)
联安革命风云	余质夫 (8)
山背、那章革命斗争概述	
.....	陈达时、陈志远 (23)
纱帽山上红旗飘	
——台中党支部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	
.....	马 平 (42)
抗日战争期间的台中党支部	
.....	何 文 (49)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台山青年学生运动	
.....	余千民 (55)
回忆李德光同志二三事，并怀念张忠、张厚同志	
.....	林 忠 (80)
革命歌谣选	甘利源提供 (70)
补遗与订正	 (87)

一九三八年我党领导主办的 台山青年抗战知识研究班

李国锐

一九三八年，我党领导举办了台山青年抗战知识研究班。该班的负责人有邝启常、古子坚、李嘉人（三人都是共产党员，日本留学生）、梅重清（即大梅，党员）等同志；教师有朱伯濂、伍示月等同志（其他教师已忘记了）。研究班的开办得到当时驻江会前线的国民党保安第七团政训员叶繁（李嘉人等同志的留日同学，即现在的县政协委员叶泽深）和国民党台山县政府余勉群（李嘉人的姐夫，后来是“民革”成员）的支持。

开班的时间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至八月底的暑假期间，地点在台城任远中学（现在的台城文化站）。全班学员有九十多人；骨干有梅易辰（即小梅，后病故）等同志。

该班的学习课程有《论持久战》等有关我党的抗战理论知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还有军事训练和游击战术等课。学习是采用延安“抗大”的学习形式，除老师讲课外，还有自学阅读有关文章和小组讨论等。记得当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书公开发行后，李嘉人同志立即阅读，马上编写讨论提纲给学员们学习讨论。这

个班的文体活动很活跃：唱歌、跳舞、演戏、打球、晨跑的气氛很浓。还经常到街头和在青年会（现公安局）礼堂宣传抗战道理和演抗战的话剧。

这个班又是扩大发展党组织的基地。全班物色思想有突出进步表现的学员约二十人左右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为参党对象，加以培养。以苏联人米丁著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年》这本书为主要学习内容。一九三八年八月，这个学习组的成员马先锋（马平）、陈泽民（已牺牲）、许洪美（已牺牲）、李血刚、李刚锋（李国锐）、吴炳芳（吴平）、谭庭荫（后来脱了党）、谭艳芳（谭清）等十多位同志（其他同志的姓名已忘记了），由梅易辰等同志先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便是梅易辰同志介绍入党的）。这些同志可以说是台山建党后第一批发展的党员，这批党员是党的种子，后来分散到台山各地继续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力量，大多数成为台山党早期的骨干分子。

这个班的党组织还介绍了一些思想上要求进步、但当时还未够条件参党的师生去延安学习。当时去延安的有伍示月老师和谭建深同志等，还有几位已忘记了姓名，其中有一位是女同志。他们出发时我们还去送车。

这个班结束后，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员为骨干组织了一个抗日宣传队开赴端芬、广海一带，一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出墙报、街头宣传及演戏等，甚为积极；一面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当时党员们很重视学习，每人每订有学习计划和阅读的书目。在端芬时，每个同志还拿出自己的书籍，组成一个图书室，以方便大家共同学习。

研究班的同学绝大部分都参加“台山青年抗敌同志会”（会址设在台城仓盈路）。研究班结束后，约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间，在广州“台开留省同学会”的负责人朱剑虹、谢永宽（当时是广州市一中的学生、共产党员）带着“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章程返到台山、开平发展“抗先”队组织，（那时的“台开留省同学会”已加入了省“抗先”。我也是该同学会的会员）。台山县的“抗先”总队，是由“台山青年抗敌同志会”为基础组成的。后来凡有党员的乡都成立了“抗先”大队，联村成立“抗先”中队，以村为单位成立小队。“抗先”成为团结青年群众活动的中心。队员经常集中学习、宣传、演戏、打球和进行游击训练等活动，甚为活跃，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好评，队伍迅速扩大。如我们密冲乡的“抗先”队有三百多名队员，占在乡青年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党在“抗先”活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挑选具备条件参加共产党的青年，通过培养，吸收入党。我们密冲乡，就发展有党员三十多人。“抗先”的活动使台山党组织迅速发展扩大，壮大了革命力量。因此，广大人民群众非常拥护。国民党反动派却甚为害怕，后来强令取缔了“抗先”的活动，甚至通缉并企图逮捕各地“抗先”的负责人。我们有许多同志被迫转移到外地参加地下活动和武装斗争。

我认为台山青年抗战知识研究班在台山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台山革命力量发展的基础。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

一九三九年夏在台城 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

梅重清

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区特委（以下简称“特委”）通过一些关系，取得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五游击区纵队司令部（以下简称“五游”）的名义，委托台山县委在台城借用台山中学的校舍，举办一个短期（五十多天）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游训班”）。

由于广大青年抗日救亡的情绪很高和对共产党的信赖，“特委”向台山、开平、新会这几个县的党和抗先的组织发出了要派送和动员党员、抗先队员、进步青年来参加训练的通知后，只四、五天时间，就有二百二、三十人来报到。

台中的校舍是宽敞的，但我们只借了它那幢高中宿舍作为“游训班”的地址。工作人员、学员一共二百四十多人挤在一起，睡觉是打地铺，工作、学习、小组讨论、文娱活动，甚至有时上课都在这幢宿舍里面进行，因此就显得很拥挤。食的是很粗糙的大米。每日“三操”、“两讲”，生活是够艰苦的。但大家都精神饱满，学习热情很高，干部、学员打成一片，团结无间，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为了保证完成“特委”交托的任务，县委依照“特委”的指示，对该班的训练要旨，课程内容和编排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并决定由我和李嘉人、梅龙夫三位同志代表县委领导和主持这个班的工作。李嘉人同志后因去了五十疗养，没有参加，只由我和梅龙夫协同朱河康同志主持。

因为“游训班”是以“五游”的名义开办，班主任就由“五游”政训室主任李汝恕担任，教育长由“五游”政训室的秘书朱河康同志(当时是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担任，大队长则由“五游”的参谋长利长江挂名(此人始终没有到过游训班)，我任副大队长，实际是执行大队长的职务。由于干部不足，大队下面只编为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向国民党保安队第七团借用一位姓彭的连长来担任，政治指导员由梅龙夫同志担任。第二中队中队长由“五游”派一位在国民党“南嶽游击训练班”毕业的周玉辉(此人政治上颇反动)来担任，政治指导员由“五游”派一位政训员雷奔来担任。因第二中队的干部中没有共产党员，我们便派在班本部担任教育干事的马平同志，以教育干事的名义到该中队去了解和掌握训练与学习的情况。小队长和班长，则在学员中挑选适当的人来担任。

训练的课程，以军事为主，辅以政治。军事分学科、术科。学科只讲“游击战术”，配以野外演习。术科则以在游击战中能用得上的为主，如装子弹、退子弹、跪下、卧下和立起，各种射击姿势，班散开和集合等；野外演习是学习方向识别、地形地物的识别和利用，利用地形地物接敌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作依托射击，目测、步测、音测，简易测绘法，

行军联络、路上侦察、埋伏、防守等。政治课是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青年问题，三民主义，以及每个星期的纪念周的政治报告等。军事课的学科和术科都是由我讲述和下达课目。政治课，因李嘉人同志有病没有参加，原拟请来讲三民主义的伍啸田因怕“游训班”染红了他而不敢来，因此只好由朱河康、梅龙夫两同志来担任。

开课后不久，台山国民党反动派竟异想天开，垂涎我们“游训班”的二百多位学员，妄想到“游训班”来发展他们三青团的团员。台山县三青团的书记长刘讯斋带了二百多张三青团入团申请表，到“游训班”来动员学员填表参加三青团。他把表发到学员的手上时，除了那两、三个是他们派来“游训班”作坐探的家伙做个样填写之外，其他的学员则通通没有填写，有的当场把表撕掉，有的拿去作大便的手纸。因此，刘讯斋这些家伙就向驻防肇庆管辖“五游”的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邓龙光告密，说什么“五游”在台山办的“游训班”，完全为共产党所把持，马少屏（“五游”的司令）是上了共产党的当，要邓龙光对“游训班”采取措施。邓龙光将刘讯斋这些家伙的密告，批给马少屏查处回报。马少屏为此特以视察为名，亲自到“游训班”来查察。由于我们应付得好，而且班主任、教育长、大队长以至中队长等都是由“五游”派人来担任，加上马少屏不甘自认上当，回复邓龙光，说经他亲自前往查察，“游训班”是在“五游”的掌握中，没有什么共产党在那里把持。刘讯斋这些反动家伙妄图扼杀“游训班”的毒计，因而未能得逞。

八月下旬“游训班”快要结束的时候，为了扩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宣传和影响，我和梅龙夫同志带领第一中队，由台城

沿台海路，边行军、边演习、边宣传，到达端芬与群众开了晚会后就地宿营，翌日由端芬转往冲葵，在冲葵进行宣传，与群众开了晚会及宿营。第三天又沿台赤路，边行军、边演习返回台城。马平同志等则带领第二中队从台城沿台新路边行军、边演习、边宣传，渡过潭江到新会双水宿营，翌日行进到新会七堡前线，然后由七堡折回双水，再由双水渡潭江返回台城。

“游训班”结束后，除少数学员派往江会前线工作外，其余都返回原来的地方坚持抗日救亡工作，和从事建立乡村武装。一九四四年台山开展武装斗争之后，不少原来“游训班”的同志，如马平、李龙英、余质夫等同志，都参加了部队（梅龙夫和何兆麟同志等则在一九四〇和四一年，先后参加珠江纵队和东江纵队），坚持武装斗争，直至解放战争胜利。李龙英同志后来遭受敌人的杀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联安革命风云

余质夫

联安是个光荣的革命老区。它是台山县最先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是台山县最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会场。联安儿女为革命流血牺牲，联安人民为革命贡献力量。

联安，在旧社会是个穷乡僻壤，群众中流传一句谚语：“贵无贡生，富无一百”。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上，广大劳动人民贫无立锥之地，天灾人祸频繁。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黑夜望天明，联安之所以成为革命老区，并非偶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国共合作抗战。一九三八年，联安全乡八间小学的教师和一些社会知识青年联合起来，组织“青年抗敌同志会”，落村演剧、演讲，宣传抗战形势，发动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从此，原象死水一池的联安，掀起了革命的波涛。

一九三九年秋，我党地下组织利用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五游击区纵队司令部”的公开名义，在台山县立中学开办了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动员四邑各地进步青年（其中有部分共产党员）参加学习。联安有余质夫、熊伟明两人参加。结业后，党派他俩回本乡负责开辟游击区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背弃国共谈判协议，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掀起

了反共高潮，妄图消灭我党的地方组织。他们公开向我党秘密领导的进步团体下手，勒令解散“青年抗日先锋队”和“青年抗敌同志会”等组织，并封闭了“抗先”台山县队部。我党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干部分散到农村掩蔽，坚持斗争，派李伦壮（即李东江）、李文海（即李立，已为革命牺牲）两同志到联安来加强领导，由我负责通过社会关系介绍他们在山潮小学当教师。是年冬，在我家里开会成立联安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由李伦壮任支部书记，李文海和我任支部委员，党员还有熊伟明（后来在革命低潮时退党）和李来就（山潮农民，一九四五年在攻打恩平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从此，联安人民就在我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

隐蔽斗争 积聚力量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至一九四四年冬这一段时间，联安的革命斗争，根据党的指示采取了隐蔽的方式，以隐蔽为主，长期积聚力量，以待时机。对某些需要公开进行的斗争，也采取较灰色的形式，并注意运用策略。

国民党反动派把各种进步团体打入地下活动后，就公开组织一个“青年群文化研究社”，妄图以此控制群众运动，消磨青年抗日救亡意志。我们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合法地位进行斗争，于一九三九年秋，将“联安青年抗敌同志会”改为“台山县青年群文化研究社联安支社”，利用一个国民党党员为社长，并选我为副社长，继续动员群众抗日。但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发现有的“青年群”组织，不是研

究什么“文化”，而是继续做抗日救亡工作，又怀疑这种组织“受共产党利用”，于是老羞成怒，下令“取缔”了。反动派弄巧反拙，自打嘴巴之后，不再批准组织什么群众团体了。好，你不批准，我就干脆既不“请示”也不“备案”，采取更灰一点的色彩。在“青年群”被解散后，我们又以打排球的形式组织了“联安体育协进会”，我被推为会长。

“协进会”把进步青年团结起来，继续进行战斗，并利用参加地区性的友谊球赛（如联安球赛、新安球赛、长塘球赛等）扩大团结面。同时，我们还创办了一个《联安月刊》，推我任总编辑，向本县各学校和海外侨胞以及本乡各界人士发行；通过各种文字形式，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投入救亡运动，同时报道乡闻。这个刊物得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不少人纷纷捐助经费、投寄稿件。《联安月刊》有的重要社论由我地下党的负责人伍伯坚同志等撰写。

一九四〇年，我地下党利用一些当地知名人士的号召和他们的财力，由熊伟明和我出面创立一间“联安市市立小学”。第一年熊伟明任校长，我任教导主任。第二年我任校长，聘请的教师有陆琼倩（即陆田同志，她到校第二年入党）和其他几位进步知识青年，招收学生八十余人。教学上公开采用国民党“审定”的常用课本，而在讲课中引导学生接受进步思想。开学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政府即借口我们的学校“没有向政府立案”，派员来“解散”。我们并没有被反动派吓倒，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质问他们，我们办学校，教育自己的子弟，有什么罪？那位官员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把学校“查封”了。当地群众和学生家长看到了反动政府的

布告和“封条”，愤愤不平。我们在社会群众和学校家长的支持下，带着学生搬到联安圩附近的大光里书馆继续办下去。因书馆太狭小，课室不够用，我们就打起“游击”来，带领高年级学生到野外和大树荫下去上课。在老师的教导和鼓舞下，同学们没有灰心，学习情绪比原来更高涨了。打了一个学期的“游击”，每个人都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下学期，我们改换了校名，叫“知行学校”，迁回原址继续上课，反动政府不敢再来过问了。

一九四〇年台城“九·廿”沦陷后，国民党反动县长陈灿章实行“不抵抗主义”，拖着党、政、军机关人员数百人逃跑到联安来避难。他们还虚张声势，借口“组织民众反攻台城”，对当地群众进行搜刮掠夺，搞得鸡犬不宁，真是一场大劫难。“三青团”的特务分子更是无孔不钻，诬称知行学校学生主办的墙报有“赤化之嫌”（实际是宣传抗战救亡），阴谋向我们伸出魔爪。我们得此情报后，立即争取主动，在群众中开展抗战宣传，指出临敌逃跑可耻，要求“县长”带领官兵亲临前线抗战，收复失地。由于他们初到这个偏僻的角落，人地生疏，脚跟一时未站稳，又来个人民要求政府抗战的压力，加上日寇占领台城约十来天就撤退了，所以他们便大摇大摆地回台城“光复”去了。我们可算幸免了这番麻烦，群众所受的这次劫难也算过去了。

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我党开始在山潮村组织贫苦农民垦荒种地，叫做“耕田会”（这是山潮农民协会的前身），将每造收获的粮食和经济作物，除留一部分照顾困难户外，其余储备起来。同时以保护农作物的名义，组织“禾更队”，把“耕田会”的积谷卖钱来购买武器弹药，三几年内买到长

短枪十多支(这个组织就是山潮民兵队的前身)。这两个组织由地下党员李来就同志负责。还办了一个农民识字夜班，除了教农民学文化之外，还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山潮村自一九四〇年开办小学后，历年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前后有李伦壮，李文海，李文启(即赵志)，伍仲实(即伍伯坚)，曹石德(即曹进文，一九四五年在朗底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黄诚宽(即余经伟)。李伦壮、伍仲实、余经伟三位同志是上级派来的领导人。还有县委书记黄文康同志(公开身份是与余经伟合本经营故衣的伙计，当地群众叫他“故衣黄”)常来检查工作，布置任务。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阴谋越来越露骨，实行白色恐怖，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我们和敌人的斗争方式方法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灵活多样，处处争取主动。因此，上级党组织决定派我打进国民党政权机关，任同安(即联安)乡“乡长”，使同安乡政府成为我们的“白皮红心政权”，成为插在敌人心脏的刀子，有利地掩护我党活动，开展秘密斗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炮制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全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以“防止逃避兵役”为借口(其征兵表面上是为了抗日，实际上是充实其反共反人民的武装兵员)，强迫十六岁以上的男人一律要领取“国民身份证”，这种“证”除了填写本人的出身、年龄、籍贯和家庭情况外，还要把十个手指的指纹详细记录。反动派为了揩油，发一个“证”(一张纸)勒索数元、数十元以至数百元不等的所谓工本费。“身份证”要随身携带，随时受拦截“检查”、挑剔、找毛病，往往找借口掳人勒索，甚至加上“共党分子”之罪名，实行镇压。我地下党外来干部，则通过我

们的“白皮红心”的乡、保政权取得“身份证”来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反动的县、区政府对我产生怀疑，于一九四三年寻找借口把我的“乡长”职务撤销了。我的政治面目有暴露的危险，上级党组织就通知我撤退了。

我撤退前的一九四二年，台城“三·三”沦陷后，党调曹兴宁同志到联安，由我负责介绍他在龙冈小学任教；同时，还调陆琼倩（即陆田）同志到该校任教。于是成立了龙冈地下党小组（由曹兴宁同志任组长），开展据点工作，团结教育农民。一九四三年，陆琼倩同志调往别地工作，党组织继调李新韶同志到龙冈小学任教，与曹兴宁同志一起工作。后来又发展林邦同志入党，并组织了一支民兵队伍，由伍来顺、伍作楫同志任正副队长。我撤退后，在上级领导人余经伟同志（山潮小学教师）的领导下，曹兴宁、李新韶、曹进文（新民小学教师）和李来就、司徒威等同志仍继续坚持阵地，秘密进行革命斗争。

建立武装 开展斗争

一九四四年冬，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党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粤中纵队司令部”，领导中区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同年十一月，台山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大隆洞九迳炮楼组织成立（一九四五年夏，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四团），首先调山潮村地下党员李来就同志到部队担任战斗员和交通侦察工作。同时党亦决定把我从鹤山县调回台山参加部队工作。在龙冈坚持工作多年的曹兴宁同志，也调到部队工作去了。当时我党组织地方人民武装力量，旨在